



回忆赵树理

高 捷 编

回 忆 赵 树 理

高捷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回 忆 赵 树 理

高 捷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8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刷: 1—
册

*
书号: 10088·960 定价: 1.40 元

目 录

DB49/1

- | | |
|----------------------|------------|
| 忆赵树理同志..... | 马 烽 (1) |
| 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 | 赵广建 (4) |
| 思念赵树理同志..... | 孙 谦 (11) |
|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 |
| ——回忆作家赵树理..... | 王中青 (14) |
| 继续向赵树理同志学习..... | 韩文洲 (18) |
| 怀念作家赵树理..... | 西 戎 (21) |
| 忆念赵树理同志..... | 陈登科 (26) |
| 谈赵树理..... | 孙 犀 (31) |
| 赵树理——卓越的说唱文学家..... | 王亚平 (37) |
| 病骨支离晤赵公 | |
| ——忆念我敬爱的作家赵树理同志..... | 奋 飞 (40) |
| 怀念赵树理同志..... | 刘 真 (44) |
| 旧居门前 | |
| ——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 | 赵广建 (49) |
| 忆赵树理..... | 蒿 子 (54) |
| 汾水呜咽泪流长 | |
| ——回忆赵树理同志..... | 史纪言 (57) |

根深土厚

——忆赵树理同志 康 澈 (66)

活在农民心中的作家

——赵树理在农村片断 田培植 (76)

忆赵树理《前岭人》写作前后 田文高 (86)

赵树理写《焦裕禄》的时候 李近义 (88)

北海公园一席谈

——忆赵树理同志与北大“五四”

文学社”社员的一次会见 侯文正 (90)

老舍和赵树理 胡絜青 (94)

求实与献身

——纪念赵树理逝世十周年 王培民 (100)
最后的日子里

——怀念我的父亲赵树理 赵三湖 (109)

赵树理老师在洞庵 陈万国 (114)

怀念赵树理同志 张万一 (119)

遥远的忆念 于雁军 (129)

忆赵树理艺术生活片断 杨 森 (137)

大树必将成林

——回忆赵树理同志 丁 宁 (144)

赵树理文集序 周 扬 (155)

美好的记忆

——怀念赵树理同志 杜黎均 (157)

逆境中的幽默 王子硕 (167)

大师的风度

——怀念作家赵树理同志 阿 农 (170)

老赵赶路

——赵树理的小故事 丁 宁 (181)

赵树理谈戏

——纪念赵树理同志逝世十周年 牛延林 (183)

别开生面的民间文艺课

——回忆赵树理 潘俊桐 (186)

一次逆境中的幸福会见 张国太 (189)

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出版 杨献珍 (193)

老赵剪影 沈彭年 (209)

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 华 山 (215)

中国大地的声音

——怀念赵树理同志 闻 山 (225)

回忆赵树理同志 原志清 (229)

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 康 涠 (232)

《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序 荒 煤 (240)

编辑赘语 (246)

附：

怀念赵树理的文章目录索引 (部分) (247)

忆赵树理同志

马 峰

赵树理同志逝世的时候，我还在乡下“学习班”里劳动。也就是说还没有获得“解放”，还没有通信和探亲的自由。这一噩耗也是过了好久以后，由同情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悄悄透露给我的。我听了，当然感到十分悲痛、十分惋惜。

赵树理同志是我所尊敬、所热爱的作家之一。战争时期，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根据地，但他的作品却是在那时候读过了，而且不只读过一遍两遍。我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不少教益，也受到很大的启示。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的活灵活现，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的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当时根据地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后来我读了一些介绍赵树理的文章，逐渐懂得了：他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作品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熟悉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物。

我认识赵树理，是在全国解放初期，那时候我们都到了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常常见面，工作上也有一些来往。那时北京市成立了一个业余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要任务是团结一些过去写章回小说的作者以及曲艺界的朋友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个叫《说说唱唱》的通俗

刊物。主编是老舍，赵树理是副主编，我是编委之一。当时至少每个月要开一次编委会，检查上一期的刊物，研究下一期的发稿计划。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五〇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急需要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这篇小说曾轰动一时，很快被改编为戏曲，改名为《罗汉钱》，搬上了戏剧舞台。他在这篇作品中，不仅揭露了封建婚姻的罪恶，歌颂了自由婚姻的美满，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小飞蛾、张木匠、艾艾、小晚、燕燕等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如果这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即使给我半年时间专门去搜集材料，也不可能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来。老赵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赶”出《登记》来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生活基础雄厚。脑子里早就形成了那些呼之即出的人物。就连那些“罗汉钱”、张木匠用锯梁打老婆之类的细节，也不是临时去“搜集材料”所能搜集起来的，而是作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积累。

赵树理在一些谈创作经验的短文里，或是在和青年作者的谈话中，总是一再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而首先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毛主席指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楷模。过去在根据地的情况就不要说了。就是全国解放以后，他虽然由于工作的需要到了大城市，但他仍然是念念不忘他所熟悉的太行山区农村，每年总要挤出一定的时间到乡下去。不是参观，不是作客，而是——照他的说法叫做和农民“共事”。也就是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去改变农村的面貌。

我没有和赵树理同志一块下过乡。一九七一年我获得“解放”后，曾在他蹲过点的一个村庄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插过二年队。他蹲过点的那个村子我也去过。提起赵树理来，大人小孩都熟悉。他们告诉我：老赵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正是大办农业社的那阵子，他不仅参与办社的大事，连改革农具，修补房屋，调解家务纠纷等等他都参与，而且是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吃饭时候，他常常是端着饭碗在饭场上和农民们聊天，也常常和喜爱文娱活动的人们一块唱上党梆子。谁都不把他当作家看待，而是看做他们当中的一员。从这里也可看出老赵深入生活的一个轮廓。甚至有人指给我看那里是“旗杆院”，那里是“刀把地”，那个人是“王玉生”——这些都是中篇小说《三里湾》中的地名、人名。我知道老赵的这部作品，并不是某一个村的村史，但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的作品是以现实生活做依据的。他的作品，不仅过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就在他被打成“黑作家”、“中间人物”祖师爷，受到“严厉批判”的时候，他的那些被称之为“毒草”的作品，照样在群众中偷偷流传着。可见林彪、“四人帮”妄图要打倒一个真正的作家，也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前二年，老赵为了深入生活方便，干脆把家搬回了山西，从事农村的实际工作，他在好几个县里担任过具体职务。后来他被“揪出来”的时候，正是在晋城县委担任副书记。

赵树理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留给我们的除了驰名中外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就是长期深入生活。

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

赵广建

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一天，阴云低垂，北风呼号。我怀里抱着含冤死去的父亲的骨灰盒，和年迈的母亲回沁水故乡。山路颠簸起伏，车内的空气沉闷得好象冻僵了。母亲一路上低声哭泣，搅得我心乱如麻，许多往事一股劲地往上涌，随着我的眼泪流淌着……

二十五年前，就是在这条路上，父亲接我和母亲离开故乡去晋冀鲁豫边区。父亲怀里抱着我，和母亲坐在一辆拉木炭的汽车上，我偎依在父亲怀里，幸福地端详着这个刚刚相识没几天的父亲。父亲是多么爽朗风趣啊！他谈笑风生，不时嘴里打着锣鼓点哼上几段上党梆子，逗得人嘻笑了一路。大家七嘴八舌和父亲攀谈，争着把自己家乡的各种趣闻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告诉给父亲，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心里有多么高兴啊！

我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生我以前几个月，他就离开了家。一九四六年，我长到九岁了还没见过父亲的面。夏季的一天，我正沿着村后的小山沟挖野菜，快到晌午了，突然有人在沟口喊我：“喂，小芬，快，你大回来了！”“什么呀？”我愣了一下，提起篮子，惊喜地朝村里跑，心里可在想：敢情是有人在

捉弄我？一进村，就看见我家院里院外挤满了人。大家见我回来了，就闪开一条路，妈妈指着被围在中间的一个又高又瘦穿着一身灰衣服的陌生人让我叫大，我羞怯地嗫嚅着。那个陌生人慈祥地笑着从台阶上下来，一把就将我抱在怀里。一个从小没见过父亲的孩子，第一次享受父亲怀抱的温暖，心情该是多么欢悦欣喜。

可是，我现在怀里抱的却是父亲的骨灰盒……。父亲是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致死的。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父亲的面了，好不容易才得到允许去看囚禁中的父亲。他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我进去的时候，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是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父亲回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说到这里，父亲眼里闪着异样的光，灼灼有神地凝视着《咏梅》。我知道他这时早已驰思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心酸地端详着父亲，看着他被摧残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身体，想安慰他，可又不知说些什么，反而是父亲劝慰我，激励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很乐观。他喜欢民间乐器，平素只要一听到锣鼓响，他一定要凑过去来几下，他一个人能同时把锣、鼓、钹等几样乐器打起来，口当胡琴还不误唱。这时不行了，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自由，可他仍然想办

法自得其乐。常常是刚被批斗完，一回家来，就拿个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喊着锣鼓点，把地上当作舞台跑圆场，逗得两个小外孙也拿着小棒跟在他屁股后边跑。每逢这时，常弄得母亲哭笑不得，叹着气对父亲说：“斗成你这样，还把你高兴的。”妈妈不理解，爸爸的这种苦中寻乐，其实就是对林彪、“四人帮”迫害他的一种坚强的反抗。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经常对我说：“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父亲热爱党、热爱人民，一直到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到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时刻，他想到的仍然是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九月十八日，已经濒危的父亲又被拉到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这时他已经站立不住了，大会开始了没几分钟，父亲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看父亲是不行了，可那些人仍然强行让父亲写所谓的检查。五天以后，父亲的“检查”写到中途就含恨死去了。丧尽天良的林彪、“四人帮”残无人道地夺去了我的可亲、可爱、可敬的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恨，象火一样燃烧在我的心头。这绝不是我个人的恩怨得失，因为父亲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他是人民大众的作家。

父亲一生热爱劳动人民。我经常听父亲说：“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读者读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是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一生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一生。父亲在谈到他是如何确定作品的主题时总爱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父亲的创作实践和他讲的完全一致。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拿着本子去收

集什么创作素材，或者是为要写什么东西而专门找人开座谈会。有一次出于好奇，我想看一看一个作家的笔记。当我打开父亲的笔记时，我愣住了，里面记的和我想的完全不同：

“1.返销粮：指标到户、分期付粮，凭证领粮。节约用粮；应做重点户的具体工作。重灾区应抓生活、促生产——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管好储备粮、要先备种子。2.水源问题：自给队——要将水充分用起来；半自给队——多费点劲引水上山，缺水队——滴水不弃，种一亩算一亩……”

一九五七年父亲送我下乡以后，我有机会实地看到他在乡下的工作、生活和写作。一九五八年秋季一天的上午，有人告诉我说父亲回来了，可是直到天黑还没见他的影子。正当我等得着急的时候，父亲进门了。我问他：“有人见你早就进村了，怎么现在才回到家？”父亲微笑着说：“我从后盔回来，看到老瓜滚在坡上，柿子都熟透了还挂在树上，心想不知山上玉茭掰了没有，就上了西坡。从西坡到磨疆，又转到了大凡，在大凡坡底看到了三队的人在那里掰玉茭，就跟他们干了一会。晌午收工回来，在杨树滩碰到支书，我俩边走边谈去了他家，在他那儿吃过了午饭，开了一个支委会。下午我俩又到各队了解了一下情况，直转到现在。晚上要开干部会，你也该参加。你想想能不能马上办起幼儿院来，这些工作，其实你们妇女干部，在男劳力抽去大搞钢铁的情况下早该想到。一个社员，更何况是一个队干部，应当有这种责任感，不能只等着支书给你分配工作任务！”

对于农活，无论是犁地、摇耧，还是扬场、撒粪，没有一样能难住他。父亲还会编簸箕、箩筐和小篮。他下乡，经常是赶上什么活都能跟上社员干，这使他非常容易接近群众。村里的干部社员都很信任父亲，把他当作知心人。父亲到哪儿，哪儿就红火

起来。社队干部找他谈工作，姑娘、小伙子喜欢听他吹拉弹唱，婶子大娘请他排难解忧，东邻西舍吵嘴打架请他评理说长短，两口子闹离婚找他说合，叔叔大爷生疮闹病请他想办法，甚至连小会计刚接账搞不来分配也找他。总之，父亲是来者不拒，什么事都管，人们来了就象到了自己的家。在他耐心认真地帮助群众解决这些问题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要把他们写进小说里，可他一旦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时，这些人和事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因此广大群众喜爱父亲的小说，称他是“我们的老赵”、人民作家。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父亲的最大的信任和荣誉，这也是林彪和“四人帮”对父亲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的原因。

父亲是一个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的人。一九五〇年母亲来北京前，父亲常带我去霞公府西口的一家小饭铺吃饭。这里的顾客全是蹬三轮、赶大车的劳动人民，卖的吃食是烤白薯、大饼、葱沾酱和老豆腐。那时，父亲已经是成名作家，又担负着领导工作，可是他喜欢在这种充满着汗味的大众饭铺里吃饭。有一次，一个当副省长的叔叔到北京开会来看父亲。他俩是老同学，又是多年的好朋友，父亲见到这个叔叔，就把他领到这家小饭铺吃老豆腐，两人边吃边谈，非常开心。

父亲一生没有积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了，进城后，家里的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按说每月该有较多的剩余，可是父亲从来不让母亲存钱，除了维持在一般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平外，父亲把剩余的工资和稿费不是交了党费，就是支援了家乡社队，接济了经济困难的同志。

父亲对我和两个弟弟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因为

自己是干部子女，就轻视劳动人民和体力劳动。一九五七年，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坚持动员我到农村做个普通农民，如果要留在北京，就在服务行业里当个售货员或是理发员。当时我想不通，觉得去农村没出息，当服务员太丢人。父亲针对我的思想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在作怪。在父亲的耐心教育下，我终于打通了思想，愉快地回到家乡务农。

父亲热爱劳动人民，人民关心着我父亲。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经常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同志向我问询父亲的状况，他们惦记他，为他所遭受的迫害愤愤不平、焦急不安。当父亲被迫害死的消息传出后，这种不相识的慰问就愈来愈多了。群众通过各种办法来表示对父亲的感情。有一次，一个熟惯的朋友，悄悄地把一本在群众中私下传阅的父亲写的《下乡集》转给我看。这是一本经过精心装订的旧书：磨秃的书角和断口都被人用透明胶纸整齐地粘贴起来，残缺的断页也被人用清秀的小字抄写补齐，笔迹不一，显然是出自众人的手。我含泪翻着这本劫后余生，被群众精心保护下来的“地下读物”，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真理是任何谎言和诋毁所遮盖不住的，人民是历史最公正的评判者。在人民的感情的海洋中，我看到了对父亲信任和同情的浪花，它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给了我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我坚信总有一天阳光要驱散乌云，正义要得到伸张，邪恶要受到惩罚。

八年来，我仔细地珍藏着父亲遗留下来的那首他亲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咏梅》，满怀信心地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父亲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当我双手把这张烙有父亲心迹的《咏梅》交给党组织的时候，我仿佛看到父亲就在我跟前，无声地向党诉说他对党中央的感激。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往昔的痛苦被今日的欢乐所代替，每当我看到周围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人们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着的时候，我总要想起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起那些为了今天幸福而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想起我的父亲，同时，我也在问我自己，应该怎样珍惜今天幸福的时代？

思念赵树理同志

孙 谦

捧读赵树理的作品，就象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原料就是大队生产和制作的粮、油、蔬菜和调味品。没有山珍海味，没有鸡鸭鱼肉，但却有浓重的乡土气味。很适口，很解馋，很有味道。放下饭碗，余味在口，往事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便一起向心头涌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太诱人，太美妙了！

三十多年前，每当一个群众运动进行当中，赵树理作品的油印本，便从太行山越过封锁线，运到了晋绥边区。请想想：《小二黑结婚》对于宣传婚姻自主，《李有才板话》对于改造旧政权，《地板》对于伟大的土改运动——那才真叫大长了人民志气，大灭了敌人威风！……赵树理的作品，真可谓之脍炙人口，而那些平凡而又奇特的语言，真可以使人永记不忘，如“霜打了的驴粪蛋蛋”、“砂锅能捣蒜……公鸡能下蛋”、地主婆的两只“小白鞋”……

语言是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段。赵树理是精通许多种语言表现手法的：他用骈文写诗，也用《聊斋》体和用十分欧化的语法写小说，但最迷人的还是他自己创造的赵树理式语言。赵树理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